

汪伪政权“东亚协同论”的形成及其文化实践

——以《大楚报》系为中心的考察

沈巍

【摘要】《大楚报》是日军占领武汉时期汪伪政权在汉口的机关报,同时受控于日本军方。为了在沦陷区特殊环境下谋求生存,《大楚报》既服务于占领体制的言论需求,又积极发掘报纸的实用信息功能以拓展其影响力。通过社论和发行《新生》杂志等出版物,《大楚报》系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理论阵地,系统阐发了汪伪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东亚协同论”,并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观点进行了曲解阐释。与此同时,报社成员也深入沦陷区文化组织,形成了以报社为中心的政治社会生态网络,此网络与“东亚协同论”构成了密切的呼应关系。

【关键词】《大楚报》;“东亚协同论”;文化实践;沦陷区

【作者简介】沈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22.3.72~83

引言

现代公共舆论的形式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社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代传媒体系的出现与急速发展,其中报纸、杂志和现代出版事业的运作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张灏认为,中国知识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自1895年到20世纪20年代有一个突破性巨变,那就是从传教士主导的“边缘性报刊”(marginal press)向精英报刊(elite press)转变,办刊的主导权也由原来属于“边缘人士”的外国人或买办阶级出身的人群逐步让位给新兴知识阶层,这些人具有政治参与热情与理性批判意识,积极推动公共舆论的形成与展开。现代知识阶层在人数上虽然不能与传统士绅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绝不亚于士绅阶层,主要基于他们与传播媒介保持着密切关系。^①

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在面临西方冲击的情况下会产生文化取向的危机,价值取向、精神取向和文化认同感诸方面均遭遇瓦解与重建的困境,这些危机造成的心理焦虑往往通过新型传播媒介蕴育的公共舆论才得以化解,许多新的思想论域也通过这个新型平台获得支持。

以往史学界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意识到报纸杂志在形成新思想文化方面的中介作用,特别是对

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城市公共传媒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对日本侵华时期汪伪政权统治地区媒体构造和传播现象的详细考察基本付之阙如。实际上沦陷区知识分子无论其政治主张如何,是否附逆投降,都是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所发表的言论也曾构成国共抗日论述之外颇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从中不仅能发现在对日态度方面知识阶层政治见解的差异性,也可体味沦陷区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精神危机及其解决办法,这些充满内在紧张感的舆论值得我们将之置于抗日战争的复杂背景下辨析和讨论。本文以武汉汪伪政权报纸《大楚报》及其报社出版物为个案,深度勾勒沦陷区传播媒介的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并集中探讨其发表的政论内容及其影响。

一、《大楚报》系的创刊与运营风格

1938年的武汉会战以国民政府军队的失败而告终,10月25日夜,日军进入汉口城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沦陷,自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日据统治。入侵的日军建立了以武汉为中心的伪政权,也亟待加强文化控制,占据信息渠道,宣传美化殖民政策。这一时期创办的日伪报刊多达几十种,《大楚报》是其中发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与之规模相当

的还有《武汉报》。

表面看来,《武汉报》隶属于日本军报导部,创刊于1938年11月10日,《大楚报》是汪精卫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机关报,创刊于1939年3月。但在这个独特的历史阶段,两个报社关系紧密,在人员任命上亦多有重合。相较于《武汉报》要求准确直接传达日本军方意图的功能,《大楚报》更有其特殊之处。就报纸本身来看,其亲日的内容形式更加隐蔽,除头版要闻社论直接鼓吹日本的军事胜利、宣扬其统治东亚的必然性外,二、三版经济、社会、文化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中尤其是武汉沦陷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娱乐资讯、商情物价等各方面信息。四版副刊“楚风”,刊登掌故轶事、小说连载、诗歌对联、笑话谜语、养生常识等休闲文字,也凝聚了一批沦陷区文人作者群。虽然报纸传播的信息真伪有待察证,但其中呈现出的丰富多样性仍不失为研究日据时期武汉生活形态、日常秩序的珍贵历史文献。与此同时,《大楚报》报社承担着多元功能,除了传播新闻,还要组织艺文活动,炮制系统理论,以召集华中沦陷区文人群体,组织教育青少年,引导他们认同并服务于占领体制。为此报社不断开辟更多的出版园地,形成报系。报纸容量由最初的四开增至对开,再扩展为对开两张,加上晚报,达到每日出版三大张的规模。除了发行日报,还出版杂志、丛书、周报。其中的《新生》杂志,在《大楚报》创刊后一个月即开始发行,专门刊载政治、经济、法律、时事类论文,由后来的社长张榆芳直接负责,又有“新生译丛”“新生丛书”作为辅助,是大楚报系最重要的理论阵地;此外,还有面向中小学生的《小学生新闻》《新小国民》等杂志随刊发行。^②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史以及日伪政权运作方式的研究尚较薄弱,其原因除文献资料缺失或不易获得外,亦起因于道德判断造成的盲点与回避态度。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把《大楚报》作为日本占领区的一个典型案例观察分析,希望对推动日据时期的政治文化现象研究提供助力。

《大楚报》在中国现代报业史中所处的位置非常特殊,对它的研究也尚处在表层阶段,原因之一在于它产生于日军占领武汉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内容特色常常因为其属于“敌伪报刊”而遭忽略,如《武汉市

志·新闻志》概述部分对沦陷时期本地新闻业状况仅以“日伪统治期间,武汉新闻阵地全被日伪所控制”草草概括。^③《湖北省志·新闻出版》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式,概述部分仅有一句:“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在武汉及附近一些县出版了《武汉报》《大楚报》等敌伪报纸,妄图借此奴化沦陷区人民。”^④原因之二是在战时条件及伪府统治格局之下,很多真实信息或无法披露,或被人销毁。原因之三是报社成员惴惴于自己为敌工作的尴尬身份,一部分成员战后作为“文化汉奸”受到审判,他们大多数人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或语焉不详,少有留下文字记述者。

对《大楚报》的人员建制,《武汉市志·新闻志》的说法是:“汪伪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机关报,创刊于1940年3月6日,日出对开一张。社长张榆芳,总编辑朱庆麟。”^⑤《新闻传播百科全书》认为该报是华中地区影响较大的敌伪报纸,“报社址在今北京路胜利街口四层大楼。日出对开一大张……初由武汉青年协会主办,律师张榆芳为总编辑;后摆脱青年会,由张自任社长,宋庆祺为总编辑”。^⑥张泰山的研究提到《大楚报》“表面是汪伪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为汉口日军特务部所控制”,这篇论文同时注意到,日军占领武汉后,组建的宣传机构有三个部分,“一是设在汉口的日军特务部,该部设有三课,其中在第二课下设宣传班,负责宣传管理;二是设在汉口的日军报道班;三是向沦陷区各县派出宣抚班”。^⑦

实际上沦陷区也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错综的人际网络,并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根据《大楚报》社管理委员会会议记录,该报第一任社长是亲日派军人雷寿荣,顾问是日本人吉田吉二郎。据《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记载,雷寿荣是湖北武昌人,生于1879年,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汉口军特务部长柴山兼四郎是其同学,武汉沦陷后,雷寿荣出面组织湘鄂赣三省指导部,成立武汉训练院,为伪府发展亲日力量,1940年病死于北平。^⑧《大楚报》第一次出刊时间是1939年3月6日,雷寿荣任社长不到一年,报社于1940年1月9日召开第一次管理委员会时,社长已换成吴海天,副社长谢希平,总编辑张榆芳。吴海天、谢希平作为正副社长任期不到一个月,2月19日,报社管理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例

会,这时的正副社长已分别换成童周、钱民荣。^⑨

1941年12月,张榆芳出任《大楚报》社长,^⑩据现有资料考证,张榆芳是《大楚报》任职最久的负责人,自1939年3月报纸创刊时即任编辑,12月升任总编辑,1941年12月至1944年5月任社长。有当事人回忆张榆芳做社长后,“把报社从江汉路鄱阳街对面迁移到了江汉路胜利街口,由朱庆麒任总编辑,方九涛为编辑主任,《楚风》副刊则由刘漾然主编”。^⑪直到1944年5月30日,《大楚报》管理委员会以“言论失当”为由解除了张榆芳的社长职务。^⑫张去职后由《武汉报》负责人庄泗川继任社长,庄到任之前由总编辑方九涛短暂代行社长职务。

1944年11月27日,《大楚报》正式开函,聘请胡敦仁为社长,沈启无为副社长。胡敦仁即胡兰成,于12月1日接受该职。^⑬据胡兰成自述,1944年11月,胡兰成与沈启无、关永吉飞抵汉口接收《大楚报》,关永吉任总编辑,池田笃纪同行。^⑭胡兰成是《大楚报》最后一任社长,他接手报社不到一年,日军投降,1945年8月26日《大楚报》最后一次出报,报社被国民政府派专员接收,改组为《华中日报》。

林语堂认为,现代新闻业的意义在于沟通和调节民众意见与政府决策,这其中存在一个悖论,即政府越强硬专制,新闻发挥功能的空间就越小,反之亦然。^⑮《大楚报》具有现代报刊的形式和出版发行机制,因为受日军控制,其新闻媒介功能只能单一地服务于日军宣传导向,但它又不像《武汉报》那样被日军直接管辖,加上经费筹措一直是个难题,这意味着《大楚报》必须在副刊内容、经营模式方面更加灵活多样才能够存活下去。张榆芳作为《大楚报》任期最长的负责人,很可能因为他具有较为灵活的经营头脑,报纸在他手中不仅形式活泼,出版规模扩大,而且增加了广告篇幅以创收。

《大楚报》由日军控制下的伪政府宣传局创办,报纸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发布伪府政令,宣传日本的军事胜利,美化其侵略本质,鼓吹中日亲善,刊登的内容也受到严格审查与控制。为了增加销量,报纸大量引入社会新闻、休闲娱乐文体和实用信息以满足普通民众阅读兴趣,激发他们的订阅需求。报纸的社会新闻版记录了武汉沦陷期间社会生活的诸般样态。例如,武汉地处江边,夏季湿热,常常爆发疫

情,日军侵占武汉次年7月,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霍乱,《大楚报》连续刊登注射疫苗的通告、尸体掩埋办法以及由疫情引发的清除垃圾污水的全市动员令,市民可以通过报纸得知当地在普爱医院、新安市场等地设有疫苗注射处,以及全市已有十余处隔离戒严等消息。在疫情爆发期间,《大楚报》成为当地民众获得防疫资讯的必备读物。经济版一直设有“武汉商情”专栏,刊登当地米面、油、糖、火柴、煤炭、烟酒、杂货等日用消费品的价格,上海金价、码头货运情形等资讯也常见报端。报社还曾增发戏剧电影周刊,并每天刊登全市影戏院上映戏码。副刊“楚风”,主要刊登小说、散文、谜语笑话,颇注重可读性,并以倡导“新文艺”自我标榜,凝聚了沦陷区很多知名作者。到1945年,日军战场失利,无暇顾及对《大楚报》的审查,最后一任社长胡兰成时而发表一些跳脱的社论和散文,总编辑关永吉则更活跃地联络当地作者,组织笔会。

二、《大楚报》系政论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的再解读

《大楚报》是武汉伪政权控制下的报纸,所以在主要版面必须发布拥护日伪政权的各种新闻消息和政论。1939年3月6日的创刊词就鼓吹《大楚报》的使命是文化建设,主张伪政权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关心“民意”,发扬“民德”和洞悉“民隐”这三项任务。^⑯《大楚报》和《新生》杂志经常在首页发表长篇政论文章,阐明报社对时局的看法,其论点大多集中讨论如何建立东亚共同体和维持日据沦陷区的和平局面。如在一篇《文化建设是新中国的萌芽》的社论中,作者声称欧化有弊无利,应该仿效日本保持和发扬东方文化,与日本进行文化合作,这是奠定东亚秩序和安全的必要条件。^⑰《大楚报》社长张榆芳和编辑谢希平也不时在报上发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观点,对伪政府的各种政策做普及性解说,其他类似伪政权国策解读的文字也常见诸报端。甚至有篇社论直接对县级行政官员的训练提出建议,主张选拔政务人员不应依赖考试和专家评议,而应注重那些熟悉地方民情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人员。^⑱林柏生曾在《二十八年的结算与二十九年的展望》一文中认为,伪政府的“和平运动”仍是国民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中国民族独立的一个重要阶段。实

现这个目标应寄望于日本放弃把中国当做殖民地的野心,放弃“侵略主义”,以兄弟之国视中国。^①可见对日本侵华政策做一厢情愿的解读是当时舆论的重要特点。1939年7月25日《大楚报》刊登《和平救国问答》,其中说道:“我们认清环境,不受白人之挑拨利用,共同努力于和平之大计,必能确保东亚之安定。质言之,果能以中日为枢纽之东亚新协同体互相结合的运动,解放东亚民族,以图东亚之自主兴隆,此诚千载一时之良机。”^②

这段话着重强调“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团结起来,而中日联盟是这个整体的枢纽,这就打破了晚清以来知识界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建国理想,其背后的逻辑是要维持“东亚”和平就不可能单单从“中国”自身考虑问题,而必须引进“中日”连带的概念才是有效的。“中国”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与日本发生更为紧密的同盟关系,这是一个重大舆论转向,实际上消解了中国维护自身独立的合法性。汪精卫把这层意思表达得相当明确,他说中国虽然谋求国家民族之独立生存自由平等,但根本问题却是必须时时刻刻自觉为东亚之一员。中国的安定与和平,必须从东亚的安定与和平中求之。因此,中国必须在外交上与日本采取同一方针,在经济上,与日本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互通有无,短长相补。^③这就是汪精卫一再言及的所谓“东亚视角”。

当然,《大楚报》以文化建设为名鼓吹中日亲善,也引发了伪政权内部的思想分歧。一部分人如伪行政院长梁鸿志直接鼓吹“失败主义”,要求伪府首先承认军事失败,再换取和平。^④雷寿荣则提出和平建国的根基是“王道”,如果日本以战胜国自居,以战败国看待中国,就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和平,必须用“王道”思想对抗“共产主义”理论和“国家”主张,否则就是恃强凌弱。^⑤陈公博则坚持说,中国要谋取永久和平,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包括中国必须独立自由,换言之,是保证国家主权和行政完整。其次中国必须要求“统一”,凡是有分裂意味的行动都违反中国的利益。第三是中国要求日本信赖中国,即应给予中国最好的和平条件,“不特昭示中国日本无灭亡之意,并且无控制之心”。^⑥这种言论实无异于与虎谋皮。对于这些在《大楚报》上撰稿的文人政客来说,要想使中日连带关系的阐述具有一定说服力,不能

仅仅依赖日本方面的强制性灌输,而必须从本国的思想资源中找到合理依据,因此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的曲解式发挥就成为建构“东亚论”的最重要思想来源。一篇题为《国际现势与亚洲联盟》的文章直接指出:“亚洲联盟之结成,必须先消除亚洲内部之纠纷,而解决亚洲民族间之纠纷,必须亚洲民族共同遵守一种主义,大亚洲主义,因为有了共同的思想,内部的摩擦,才能免除,最近中日两国尚未获得全面的和平,越泰两国,又复交恶,如果外洲人士,继续不断地挑拨,说不定亚洲各民族之间,还有许多纠纷发生,如果亚洲内部在纷争之状态中,对于亚洲不配言中立,更不能言战争,因此本抱大亚洲主义之亚洲联盟的结成,是刻不容缓的。”这种大亚洲主义并不是从日本思想脉络中自然引申出来的,而是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的重新解释,即以“公理正义”为原则,重新思考中国与亚洲主要是东亚的关系。作者特别指出:“我们主张内亚洲联盟,须完全以总理之大亚洲主义为依据,也就是亚洲联盟的组织,必须依据公理正义,必须以东方之王道精神及仁义道德为基础,这样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结合。才不会重蹈以前各种国际和平组织失败之覆辙。”^⑦文章申明继续遵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宗旨。回顾孙中山以往论著,可以发现,自1897年他与平山周谈话以后,一直到1924年,孙中山曾多次谈到中日关系及如何理解和贯彻“大亚洲主义”的问题。

民国初建时,孙中山已经注意到中国与日本友好相处的重要性,他在1913年说:“现今五洲大势,澳非两洲,均受白人之钳制。亚洲大局维持之责任,应在我辈黄人。日本与中国唇齿之邦,同种同文,对于亚东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辅助进行。”孙中山早年从事反清活动时曾得日本浪人大力支持,心怀感激之情,所以他如此表示:“东亚地方,得留与我辈成就革命事业,都是日本之力。中国此次革命成功,对于日本,不能不感谢。日本与中国利害相关,欲保全日本利益,不得不保全东亚利益。大凡立国,必须与利害相关之国,携手进行,方能进步。利害不相关之国,纵彼欲与我相亲,都成不可与之亲近的。”又有诸如“亲日政策,外交上之最妙着”^⑧“日本及中国实兄弟之国也”“是贵国者,予之第二故乡”“假使此双生之兄弟,有相阅之事,则亚细亚之一家,绝不能保持

其平和”这类充满主观感情色彩的外交辞令。^②

孙中山也把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看做是亚洲民族独立觉醒的标志,称赞“日本人战胜俄国人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这次战争的影响,便马上传达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一个极大的希望”。孙中山最为系统的大亚洲主义阐述是从比较中西文化入手的,他最著名的论断就是称欧洲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中国文化为“王道”的文化,他详解两者的区别时说道:“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语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③

最终孙中山把“大亚洲主义”归结为文化问题,并做出如下论断:“我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所谓“大亚洲主义”“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又说:“近来欧美学者稍为留心东洋文化,也渐渐知道东洋的物质文明,虽然不如西方,但是东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④这段话看上去与晚清流行的“中体西用说”有很接近的地方,都是强调中国文化作为“体”相对于西方的“器技之道”具有历史优越性。

孙中山还警告日本说:“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⑤孙中山为宫崎滔天《三十三年落花梦》作序时也说过“襄成兴亚之大业”的话,甚至其联日抗欧的构想最终被塑造成孙中山去世前的“托孤遗教”。

以上我们详细摘引了孙中山有关“大亚洲主义”的若干论述,在《大楚报》系所构建的“大亚细亚主义”论述中,不少论者也屡次征引孙中山有关“大亚洲主义”的观点支撑自己的理论。比如在一篇名为《总理遗教与东亚联盟》的文章中,作者大段引用孙中山在神户的演讲,并发挥说这是“总理为了达成三民主义的世界革命的唯一桥梁,又可以说是三民主义之国际性的具体表现。因为整个亚洲民族,都是西洋赤白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的殖民地目标,亚洲各个民族,要想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必需一致起来,反抗西洋全体霸道国家的压迫,惟有如此才能够完全葬送西洋霸道势力于坟墓。东洋王道主义战胜的一天,也就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共同享受自由幸福的时候”。这段话在大亚洲主义、三民主义、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建起一条紧密衔接的线索。^⑥

在《大楚报》报社出版的《新生》杂志中,甚至出现了以“大亚洲主义”修正“三民主义”教义的观点。在一篇名为《新中央政权的思想基础》的时评中,作者写道:原有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建筑在原子论之上,从而以欧战后渐趋没落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方法,求民族主义的贯彻,乃国民党理论的当然的归结,这在思想上已难免时代错误之讥”。作者质问重庆政府所主张的抗战,即使是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战,那么他们不惜与欧美国家建立紧密的依存关系,强化列强榨取弱国的能力,难道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何况日本正在扬弃资本主义的榨取性的侵略性,向更高的阶段飞跃”。^⑦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新型的民族主义呢?“民族主义”是以协力团结血统上、人种上、文化上、地域上、运命上、历史上有密切关系的诸民族——大和民族和满洲民族为前提,所以中国的解放应通过东亚协同比而实现。“假使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可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民族主义,我们的民族主义可称为协同主义的民族主义”。

至于民权主义如何修正,作者也给出了一个新思路,即把国家的进化分成三种形式:尊重国家权威的警察国;尊重个人自由的法治国;尊重国家和个人的文化国。民权主义就是企图使数千年来停滞在警察国阶段的中国上升到法治国家的新阶段,可是现

代先进国家都会逐渐进化到文化国,所以中国也不能满足于只达到法治国的水平,而要超越法治国,前进到文化国的阶段。因此“我们不应把个人单视为权利的主体,也不应单视为义务的主体,我们应以机能的协同为基础考察个人,如此则国家的优位和个人的尊重都获得了保障,这可称为协同主义的民权主义”。作者转而指责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站在民族自由主义的立场,主张民族主义,一面以抗日求民族主义的实现,他面却不得不强化对于欧美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依存关系,这是抗日的民族主义的矛盾性,也是它的根本错误”。^③这篇文章表达了一个清晰逻辑,民族自由主义就是民族个人主义,另一方则是抽象的国际主义。文章的结论是“掀起这次中日战争的祸根是民族自由主义,而欧美帝国主义诸国和第三国际更是从事挑拨离间,为种种阴谋的策动”。^④

张榆芳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主旨的改篡主要表现在试图消解原有“民族主义”捍卫国家独立的思想内涵。孙中山虽然早年参加革命时颇多依赖日本友人的帮助,民国建立以后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也不时提到日本在东亚复兴中所起的表率作用。但孙中山始终认为,中国必须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才能真正立足于东亚,而不是在牺牲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与日本纠缠不清地暧昧合作。张榆芳等人对“民族主义”的再解释是从批判欧洲殖民主义出发,抨击西方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民族观过于强调国家之间呈原子状态,造成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同时又试图证明这种自由主义模式并不适合东亚的历史现状,要真正建立起具有亚洲特色的民族主义理论,就应该更多突出中国与日本的“连带关系”,更多倾向于“合作”而非“独立”,因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兄弟,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不过是朋友关系,兄弟之间更应该不分你我,朋友之间尚可保持距离,这显然曲解了孙中山的原意,也为日本侵略中国编织了合理的借口。再举一例,一篇题为《亚洲民族解放的起点》的文章把亚洲解放当做中国解放的前提条件。其中说到“复兴中国与复兴东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中国民族要求解放,没有东亚复兴是不可能的,作者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长期祈求利用列强之间的相互牵制,反而造成了中国民族独立生存的危机。具体来说,就是抗战中蒋介石政权想利

用列强之间的利害冲突,希望求得一条生路,却反而削弱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力量。^⑤

还有一种论述方式是通过攻击蒋介石一党独裁,单靠平衡欧美势力维持现状,而忽略与日本媾和的可能性。在《国民党修正三民主义》一文中,作者抨击“蒋介石为增强伪国民党之专制,及自己之独裁权,力倡民族主义,采取排除其他民族主义,尤其日本之方针”,最终解救的办法只能采取修正过的民族主义,“根本消除以偏狭之见解而以孙中山之大亚细亚主义为立足点”。实施彻底尊重民意,排除独裁制度的民权主义。^⑥这篇文章论证的重点仍在如何搞好与日本的连带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上。

三、“东亚协同论”的论证模式及其组织形态

前已述及,《大楚报》系的政论试图通过改造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中的“民族主义”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思想辩护,这只是其营造亲日舆论的关键环节之一,关于中日如何共荣并存的论说持续出现在《大楚报》和相关杂志的议题之中。《大楚报》报社首先致力于从历史源流和民众感情上重构中日之间的文化关系。在《扬弃传统的日本观》这篇时评中,作者写道,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微妙得像北京料理中的酸辣汤一样,它由轻视、怨恨厌恶等等极复杂的心理交织而成,而产生这种种心理的酵母,乃从部分的(或许不正确)观察所获得的关于日本的断片的知识”。作者继续分析说:“一般国人认为日本的古代文化,传自中国,近代文化,继受西洋,在人文史上,日本仅有模仿而无创造。就前之关系而言,中国为日本之师,就后之关系而论,中日同为西洋之徒,故以后进国视之日本乃国人之通病,而五千年的文物制度,复昂扬国人的优越感,结果益增轻视日本的心理。”^⑦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呢?有一个办法是互相利用各自优势,建立起一种利益共同体。因为“中日两大民族,既居主位,又系同文同种,兄弟之邦,有悠久互相提携的历史,一个是天然的财翁,一个是技术的天才,中国无日本,终于贫弱,决难幸存,日本无中国,虽然富强,不能久远”。^⑧有人还提出用“东亚人”的身份意识打消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误解,以此消弭对各自国家的认同所造成的心理边界,好像如此一来就可消除战争历史,在统一的身份认同下创造新的和平局面。提倡

东亚人“第一是足能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增进其感情”。过去人们总是推诿说,“这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而东亚内国家尚很多,于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会遮掩住东亚解放与世界的矛盾,因为人类在现阶段思想上常常会被实际问题占住优胜,如此由物到心,由心到物,无形中就制造与产生了大批东亚解放的内奸,或者说是心理上的敌人。这些心理敌人不铲除,东亚共荣圈也就难有保障”。^⑨

有的言论更趋露骨极端,把中日关系提升到“思想战”的高度。《新生》杂志发表的一篇摘译自日本报刊的文章,径直说到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改革英美支配下的东亚旧秩序,建设为日本所理想的新秩序,“大东亚战争”也就成为对英美的民主主义、国际主义的一场“思想战”。作者提出德国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就是败于“联合国”和英法操控的“思想战”,这场思想战源起于欧战后建立的华盛顿体制与凡尔赛体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东亚战争就是对此体制压迫的反抗。在思想战中,只要做到思想的统一,能够使对方的思想与自己的政策合流,则改革具体的问题就不需要一一进行解释,对方就会自动地根据其思想对自己的政策加以有利的判断,发起有利的行动,这就是思想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原因。因此东亚共同体的建立首先应该统一思想,然后才能对付共同的欧美帝国主义。^⑩

与欧美的民主主义思想相比较,东亚联盟确实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基础,此理论炮制者也承认“在今日,我们的心灵空虚异常,深切感觉缺乏精神食粮之饥饿的苦痛”。^⑪日军侵华取得阶段性军事胜利后,也积极谋求与沦陷区文人群体建立合作共谋的关系,控制青年人的思想阵地。与此目标相适应,这一时期武汉地区出现了若干貌似民间团体实则受控于日本军方的文化组织,其中很多人身兼数职,以报人为职业身份,以报馆为活动基地,串接起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信息网络。《大楚报》也是沦陷区信息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同时也在上述文化团体内担任重要职务。

在这期间,《大楚报》不断增加版面和发行增刊,报纸由四开小型的朝报,改成对开两大张朝报,并且增刊一种四开小型的晚报。另外为提倡所谓“新文化”,出版了小册子式的《新生周刊》,在大楚报社发

起“武汉文化重建座谈会”。《大楚报》还增添了《文化周刊》《教育》《戏剧》《青年》《妇女》等副刊,报社成员参与组织成立广雅学会,通过研究张之洞的生平学术探讨武汉文化前途与影响等问题。^⑫武汉舆论界把张之洞塑造成了“东亚自存主义”的领袖,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欧美依存主义相对抗的英雄人物。广雅学会给予张之洞以如下历史定位:(一)张文襄公是东亚自存主义的祖师;(二)张文襄公是抵抗欧西侵略唯一全胜的统帅;(三)张文襄公是东亚新建设的创造者;(四)张文襄公在湖北是日本新文明输入的发祥地;(五)广雅学派之接受新文化是以日本业经融化之欧美学术为基础的。^⑬

《大楚报》挂职社长谭道南另一个更持久的身份是武汉青年协会会长。武汉青年协会初名华中青年协会,成立于1939年6月11日,同年11月改名为武汉青年协会,1941年5月又宣布改组为华中东亚青年联盟。^⑭据联盟的公开宣言称,其成立宗旨为“以华中青年团结为基础,进而谋全国青年之大团结,共同努力谋建设独立自由健全富强之新中国,参与树立东亚新秩序……由本会领导青年,从事组织,并加训练,灌输正确之文化及政治思想。主张武汉民众运动,热烈拥护为复兴中国安定东亚之新中央政府,同时协力推动社会福利事业之发展”,据说两年之内就发展了二万余名会员,每月经费由国币五千元增至三万余元,由伪府财政部湘鄂赣临时财政整理委员会拨发。^⑮

这一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招募青年为日军战时宣传体制服务,其出版品《青协周报》和《武汉青年月刊》,大力宣传伪府政策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思想,将中国的复兴和民族解放等同于东亚新秩序的建立,号召国人仇视英美,效力于日军。^⑯其“所谓东亚联盟,含有东亚民族联合起来共同防御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意义”,^⑰对青年人也颇具迷惑性和鼓动性。《大楚报》的谢希平、张榆芳担任华中青年协会的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一直是其骨干成员,《大楚报》编辑朱庆麒、刘漾然、张丙三、杨世英等也在协会中任职,因为这个原因,以《大楚报》作者为中心的“笔者俱乐部”一直由武汉青年协会提供活动经费,与后者保持密切关系。

武汉(华中)青年协会从建立之初就在日本顾问

和军方的严密控制之下,其组织形态和工作性质清晰体现了日军侵占华中地区初期的统治需求。建立为战争服务的文化体制急需吸纳知识青年,同时,侵略者也迫切需要培植一批世界观尚不成熟的年轻人,诱导他们真心认同日本文化的优越性及其在东亚的统治地位,成为日本价值观在中国的有效输出者,以便长期稳定地为日军侵华服务。以此为目的,日本军方挑选了青年协会的五名男女青年,在日本顾问小坂武司的带领下组成一个代表团,于1939年7月25日起开始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旅行访问,这五名代表分别是青年协会的干事长田重光、发起人之一朱淑媛、《大楚报》的编辑张榆芳、谢希平以及金陵女子大学的欧阳宁,代表团的行程是出席在朝鲜京城举行的日华满青年交欢会,顺路参观日本及伪满洲国各大都市。中日六人代表团的这次“东游”由日军和伪武汉市政府共同派遣,沿江游历日本占领的南京、上海,受到了军方最高规格的接待,然后由长崎登陆日本。

对这次旅行的目的,谢希平写道:“是趁便把日本及满洲国各重要都市巡游一下,看看近年来日本各方面的进步,以及满洲国最近建设发展的实情,并且利用这个机会,以中国青年代表的资格,和日满二国的知识青年,去尽量接触一下,交换交换对于兴亚运动的意见。”^⑧这样的活动在日军侵华后尚属首次,伪府宣传局顾问船越寿雄、《大楚报》顾问吉田吉二郎、当时任《武汉报》主编的庄泗川都对这次行程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六人代表团临行前,还专门受到日本海军特务部、陆军特务部和总领事馆的接见。这次旅行的确向年轻的中国代表展示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与城市文明,让一行人直观地感受到“合作”的前景,张榆芳在回武汉后写道:“日本人民对于我们非但没有丝毫歧视的心理,就我个人所感到,他们对于我们所表示的好意,且远甚于事变以前……我们方才知道血缘的近似,文化的交流和地域的邻近所交织而成的相互的爱慕,在中日两民族的血管里,有怎样的强韧性。”^⑨日本占领当局看到了现代化成果对中国青年人的感召力,希望以此为支点建立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同,进而重新打造他们的世界观以及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成为“东亚新秩序”的拥护者。日本的文化渗透策略至少在张榆芳和谢希平身上得

到了成功体现,二人都以《大楚报》编辑和撰稿人的身份活跃于武汉的中日团体之中,成为日军宣传系统的骨干分子。

继武汉青年协会之后,1941年3月5日,又成立了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这是中日文化协会的分支机构,后者于1940年在南京成立。武汉分会的理事长是伪汉口特别市市长张仁蠡,名誉理事长是伪湖北省政府主席何佩瑢和日本驻汉总领事田中彦藏,伪府高级官员石星川、叶蓬、高伯勋、徐养之,日本军方落合甚九郎、落合鼎五、福田贞三郎、太田实等都在该会挂职。

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同样以推进“战时文化”为主要职能,相较于武汉青年协会,武汉分会的成员直接来自日本海陆军特务部和伪政府,其人员结构的安排能够更有力和直接地控制地方文化体制。曾任《大楚报》社长、《武汉报》主要负责人的庄泗川在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担任总干事的职务,而担任《大楚报》社长、编辑的谭道南、张榆芳、谢希平都在该会任职。从组织人事看,该会下设艺术组、出版组、学术组、观光组、总务组,每组均由中日双方共同负责。《大楚报》编辑谢希平是该会艺术组的负责人,据他的工作报告,1941年该会的活动,包括举行文艺座谈会、夏令音乐座谈会、弈棋比赛会、电影放映大会、美术展览会、庆祝游艺大会等,几乎所有当地公开的文化娱乐活动都由该协会主办,其中必有日方人员参与,以借此场合推广日本文化、鼓吹日本的军事胜利、宣传“大东亚共荣”。例如,在“举办电影放映大会”细目中,包括时局影片放映会和大东亚战争新闻片观览会,举办活动的目的在于“唤醒武汉市民,及中小学生之时局精神,彻底明了太平洋战争,友邦日本海军之伟力,因而巩固必胜之信念”。该会举办的群众游艺大会,则包括“纪念武汉更生三周年纪念大会”,主题是庆祝日军占领武汉,还有庆祝中日基本条约签订周年纪念大会、庆祝日军占领新加坡演讲游艺大会等。^⑩该会还设有编译委员会,出版译介日文书籍,同时设立了中日语文补习学校,在当地教授日语,精通日语的庄泗川、张榆芳成了其中骨干。

中日文化协会成立后,急于收编管理各个武汉社会团体,首先通过汉口特别市政府发出训令,各社

会团体将负责人姓名地址上报中日文化协会,以便于控制,总共收到9个团体的登记记录,包括文学类2个,国剧类2个,体育健身类3个,教育类2个。^①这些组织后来发展延伸为中日文化协会的许多下设团体,包括武汉青年剧团、文协国剧社、武汉美术协会、武汉音乐协会、武汉儿童文化研究会、武汉文学学会、江阳会、武汉歌话会、日语研究社、长江画刊社、电影研究会、艺术讲座同学会等等。其中的武汉文艺协会,前身即是以《大楚报》作者为中心的“笔者俱乐部”。1940年初“笔者俱乐部”先是变为“武汉作家协会”,出版《武汉作家月刊》和《作家半月刊》,同年7月“武汉作家协会”改组为“武汉文艺协会”,出版《文艺月刊》和《文艺周刊》,由于其常务干事谢希平、张榆芳同时还担任武汉青年协会的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武汉青年协会一直为武汉作家协会提供经费。明确并入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后,对外公开的经费来源均出自伪政府与武汉青年协会的共同补助,《大楚报》的记者、编辑也更深度地介入了中日文化协会,谢希平、张榆芳、朱庆麒、刘漾然、张望等都是其中的活跃成员。

实际上《大楚报》系的主要作者一直都在寻找建立东亚秩序的合理论述框架,以图在精神层面能够与英美坚持的国际主义原则相抗衡,张榆芳、谢希平等人都是这方面的活跃分子。其核心论域就是讨论如何建立东亚政治文化协同体系。为此张榆芳不惜把日本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说成是一场“圣战”的开端,有些文章干脆把“七七事变”定位为“兴亚日”,宣称是“亚洲民族解放的第二声”。^②“卢沟桥事件”被赋予了“以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意义”,“我们可以观取一种新的思想已以战神为母亲而出生了”,“以代替自由主义的现秩序的思想”等等歪曲涵义。而这个“新思想”的核心是“从资本主义的大陆经营的形体发展为东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协同形体”。张榆芳把这种思想概括成“东亚联盟论”“东亚集团论”“东亚协同体论”三种类型。“东亚联盟论”注重政治方面,“东亚集团论”注重经济方面,“东亚协同体论”注重文化方面,这三种类型的思想在世界史上应该各有不同的意义,而“东亚协同体论”最能体现精神上的高层追求。^③

在《东亚新秩序论》这篇长文中,张榆芳具体讨

论了这三种思想模式的得失,他认为“东亚联盟论”只是“国际联盟”的缩小版,有过于抽象的弊端,因为“在东亚联盟,因各民族的目的性,全体性,从而各民族的自由、平等过分地被重视,故全体的统一单是外面的,各民族所构成的全体性遂遭牺牲”。而“东亚集团”的设计可以把各民族统一在“内面”之中,使“东亚”得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全体。可是在这个框架里,各民族却失去了目的性、全体性、独立性,单单成为全体的机关,成为“超民族”的机构,因此,东亚集团容易转化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关系。与之相比,“东亚协同体”可说是东亚集团和东亚联盟两个方案的综合,这个方案声称“以各民族为全体性,为目的,承认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采纳了东亚联盟的长处……各民族仍维持自己的独立、互异机能,以构成一个具体的全体”。也即是说,“东亚协同体”并非像“东亚集团论”那样承认支配与被支配的现实关系,它一方面保存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同时又使各民族仍维持自身的自由平等地位。于是“东亚协同体”最后成为指导东亚建设的精神基调,正因为其强调文化的性质,所以当时有人认为它具有乌托邦的倾向。^④

张榆芳并非没有考虑到日本侵略对中国维护自身主权所造成的危害性,所以他曾一再说明要把亚洲“统一”与中国独立解放看作是一体两面的任务,“纵令它对于日本是新秩序,对于中国就未必是新秩序”。同时东洋解放的核心是中国的解放,不以中国的解放为核心的东洋解放也就仅仅意味着日本向欧美帝国主义的水平运动而已。^⑤这种新秩序既不是国际联盟,也不是西方素持的“门户开放”政策。谢希平甚至认为,欧美列强挑拨离间,尽量向中国宣传日本的野心,同时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说,作为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的护符,迫使中国沦为公共殖民地,造成中日两国互相猜忌,无法养成亚洲自主的势力。^⑥由此可知,经过不断努力,以《大楚报》系为中心基本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东亚协同论”的思想体系。这些理论通过以《大楚报》系为核心的各种文化组织传播到武汉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之中,成为伪政权树立自身舆论正当性的思想与组织来源。

结论

本文对《大楚报》办刊风格和政论内容所做的个

案研究表明,报纸杂志作为一个城市的信息载体,在日据时期被有效应用于宣传大东亚共荣的殖民策略,成为推行政治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报纸杂志并非在孤立地传播政治信息,它与那些亲日组织之间经常形成关联互动的格局,报社成员往往也是文化组织的重要参与者,报纸对舆论的选择报道与这些组织之间的活动构成有机的亲密联系,成为沦陷区城市政治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围绕《大楚报》系及其相关组织构成的传播网络,一度被学界视为无足轻重。从其思想内容和传播方式而言,《大楚报》系的大多数文章在表述上粗糙生硬,缺乏逻辑严密性,不少观点因紧跟日伪政权的政治宣传导向而流于浅薄无力,但是应该看到,报纸的功能性和信息垄断地位使其仍具备极大的影响力,不失为我们理解沦陷区思想文化生活的一种鲜活样本。

《大楚报》系的基本思想观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重新引用和阐释孙中山有关大亚洲主义的论述,并刻意曲解;二是迎合日本思想界有关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各种舆论,强调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具有共同的文化合作基因。前者是从中国既有的现代思想中寻找中日一体化的合理性,后者是极力阐明通过建立中日亲善的黄种人协作机制以对抗西方白人殖民的必要理由。这两种理论不但刻意歪曲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也削弱了中国建立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的正当性。

《大楚报》系文章所体现出的以上两种思想倾向在当时即已遭到国民党理论家的激烈批评。如胡汉民在1935年撰有《远东问题与大亚细亚主义》一书,专门批驳汪伪政权的“大亚洲主义”,极力澄清其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的诸般误解。作者痛心于日本侵略者和伪政府将“大亚细亚主义”说成是“总理遗教”,也极力驳斥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九一八事变的思想根源这种说法。

胡汉民以为,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首先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世界主义”。前者的主旨是中国的建国历程应该从中国内部的家庭家族开始凝聚,一路延伸出去直到国家独立世界大同,其公式为:家族—宗族—中国民族—亚细亚民族—世界主义(大

同),这条公式首先强调中国作为国家地位的独立性。至于说到日本与中国的相互提携,并非是指日本可以领导中国或者应该凌驾于中国之上,而是提示日本不要效仿西方的“霸道”,反而应该在“王道”政治上做出榜样。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应该一起各自作为独立国家而非维持一种边界模糊暧昧的东亚协作共同体,作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基本单位。

胡汉民概括“大亚细亚主义”的原则是:假如中国讲“大亚细亚主义”,那么唯一的要求就是要首先实现中国民族之独立,假如日本也讲大亚细亚主义,则日本的任务,就在于以王道精神,协助亚洲各民族独立,共同抵抗欧美帝国主义侵略。^①其中心词是“独立”而非“协同”,“平等待我,共同奋斗”才是其中之精髓,“协同”的意义并非局限于大和民族,斯拉夫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甚至印度民族都可一起共同奋斗,孙中山采取联俄策略就是证明。这是胡汉民等正统国民党人与汪伪政权有关“大亚细亚主义”论述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胡汉民还引用孙中山的话提醒说,大亚细亚主义对日本来说是把双刃剑,因为日本是被中国当做兄弟来看待的,欧美不过是朋友关系。朋友侵略中国,做兄弟的也居然趁火打劫,这被侵略的老大哥应该更恨朋友还是更恨兄弟呢?日本虽然批评欧美在中国实行利益均享的“门罗主义”,却又发明了一种打着“同文同种共存共荣”旗号的所谓“亚洲门罗主义”,其本质就是想独占中国。^②在今天看来,胡汉民对汪伪政权“大亚洲主义”的批评仍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

注释:

①张灏:《中国知识的转型年代》,见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②《本报四年来概况》,《大楚报》1943年3月6日。

③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页。

④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新闻出版》(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⑤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新闻志》,第73页。此处创刊于1940年的说法有误。

⑥邱沛篁、吴信训、向纯武等主编:《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1页。

⑦张泰山:《论抗战时期日伪在湖北沦陷区的文化控制模式》,《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⑧章绍嗣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573页。

⑨武汉市档案馆藏,档案号8-4-43。

⑩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S7-3-3786-1。

⑪恒清:《武汉沦陷时的报刊》,《武汉文史资料》1997年第1期,第124页。

⑫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S7-3-3909(2)。

⑬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LS51-1-65-33。

⑭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305页。

⑮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7-98页。

⑯《创刊词》,《大楚报》1939年3月6日。

⑰《文化建设是新中国的萌芽》,《大楚报》1939年4月30日。

⑱《对于训练县政人员之意见》,《大楚报》1939年4月20日。

⑲林柏生:《二十八年的结算与二十九年的展望》,《大楚报》1940年1月1日。

⑳王武刚编:《和平救国问答》,《大楚报》1939年7月25日。

㉑汪兆铭:《二十九年之元旦》,《大楚报》1940年1月1日。

㉒梁鸿志:《民国二十九年元旦感言》,《大楚报》1940年1月1日。

㉓雷寿荣:《和平建国的政治基本工作》,《大楚报》1940年1月1日。

㉔陈公博:《怎样才可以使中日永久和平》,《大楚报》1940年1月1日。

㉕《国际现势与亚洲联盟》,《大楚报》1940年10月19日。

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3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26页。

㉗《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的演说》,1913年2月15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页。

㉘《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3、405页。

㉙《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5页。

㉚《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页。

㉛《总理遗教与东亚联盟(下)》,《大楚报》1941年3月26日。

㉜编者:《新中央政权的思想的基础》,《新生》第1卷第9期,1939年8月1日,第2页。

㉝编者:《新中央政权的思想的基础》,《新生》第1卷第9期,第2页。

㉞张榆芳:《东亚新秩序论》,《新生》第1卷第9期,第5页。

㉟《亚洲民族解放的起点》,《大楚报》1941年3月10日。

㊱《国民党修正三民主义》,《新生》第1卷第16期,1939年11月15日,第15页。

㊲编者:《扬弃传统的日本观》,《新生》第1卷第15期,1939年11月1日,第1页。

㊳寿春:《大亚细亚主义的和平阐述》,《新生》第1卷第15期,第10页。

㊴石平:《消除国家隔阂,要提倡东亚人》,《新生》第6卷第1、2期合刊,1944年2月25日,第21页。

㊵天兵摘译:《大东亚战争与思想战》,《新生》第6卷第5期,1944年5月25日,第8-9页。

㊶郑燕生:《文化田的稻麦呢》,《新生》第6卷第5期,1944年5月25日,第15页。

㊷刘禹存:《由大楚报的提倡新文化专业谈到武汉新文化问题》,《新生》第1卷第13期,1939年10月1日,第10页。

㊸丽南:《张文襄公东亚自存主义的广雅学会》,《新生》第1卷第13期,第12页。

㊹《武汉青年协会使命完成,昨决定发展的解消》,《大楚报》1941年5月21日。

㊺武汉青年协会编:《武汉青年协会二周年纪念专刊》,1941年,第1页。

㊻《青协周报》第35期,1941年4月21日。

㊼谢希平:《东亚联盟的思想体系》,《武汉青年月刊》第2卷第5期,1941年4月。

㊽谢希平:《东行散记》,武汉:大楚报社出版部,1939年,第1-2页。

㊾张榆芳:《东行漫记》,武汉:大楚报社出版部,1939年,第37页。

㊿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编:《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周年纪念特刊》,汉口:光明印刷书店,1942年,第67-70页。

①武汉市档案馆藏,档案号8.4.17。

②希平:《兴亚纪念日应有的认识》,《新生》第1卷第7期,1939年7月1日,第5页。

③张榆芳:《七七事变的史的回顾和它的发展》,《新生》第1卷第7期,第9-10页。

④张榆芳:《东亚新秩序论》,《新生》第1卷第9期,1939年8月1日,第6-7页。

⑤张榆芳:《东亚新秩序论》,《新生》第1卷第9期,第3页。

⑥谢希平:《东亚联盟的思想体系》,《武汉青年月刊》第2卷第5期,1941年4月20日,第1页。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黄硕公:《门户开放与九国公约废弃论》,《新生》第1卷第9期。

⑦胡汉民:《远东问题与大亚细亚主义》,中兴学会印行,1935年4月,第32页。

⑧胡汉民:《远东问题与大亚细亚主义》,第36页。